

近代史研究

1

1979

近代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史研究

(第一辑)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排版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 1/2印张 259千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统一书号: 11190·023 定价: 0.93元

目 录

往事回忆·····	彭德怀 (1)
范文澜同志的科学成就·····	刘大年 (28)
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	黎 澍 (44)
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	刘大年 (58)
实事求是和历史科学·····	丁守和 陈文桂 (70)
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	胡 绳 (96)
百团大战问题的探讨·····	蒋 杰 (164)
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	杨天石 王学庄 (176)
戊戌政变后的唐才常和自立军·····	汤志钧 (215)
五四时期李大钊的反孔思想在中国 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邓艾民 (229)
清末十年间的币制问题·····	张振鹍 (249)
蓝大顺问题考·····	罗尔纲 (288)
韦昌辉伏诛时日考·····	赫治清 (295)
山东义和团转进直隶说质疑·····	李宗一 (303)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补证·····	曾业英 (320)
辛亥革命的下限·····	朱宗震 (325)

往事回忆*

彭德怀

(一)

一、共产党给了我政治生命

一八九八年，我出生在一个下中农的家庭里。幼年时因母亡父病，家中即破产变成了赤贫户。我小时候只读过两年私塾，后来因家庭贫困，便给人家当了两年放牛娃。十三、四岁又在煤窑上做了两年工，以后回到家中耕地。

一九一二年，当地农业歉收，再加上地主逼租逼债，多数农民发生饥馑。由于穷人们不甘心饿死，自发地闹粃吃大户。我当时是倡导者之一。后来，此事被地主告发，加罪为聚众闹粃，扰乱治安，因此我便逃至洞庭湖西林围一带，当了两年多挑土工人。由于我饱尝了地主老财们的压榨，深知农民痛苦；我有一个伯祖父（名五十老倌，参加过太平天国洪秀全部）经常给我讲太平天国的故事。所以，我当时便产生了打富济贫、消灭财主和为穷人寻找出路的思想。于是，在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我便由担土工人投入了湘军当兵，参加了驱逐汤都督（即汤乡铭）之役。

一九一九年，我在湘军任排长——连长职务。由于当时我对洋人在中国横行不满，再加上原有打富济贫思想，所以在部队中

• 这里发表的是彭德怀同志的两篇遗稿，标题为本刊编者所加。

便开始了秘密活动。我们组织了“救贫会”，会员都是穷人出身的士兵。此会的口号是，灭洋人收回海关、租界；灭老财救济穷人；反对克扣军饷。这个秘密组织，得到了所部较多的士兵拥护，而发展到七人，并设有委员会为核心领导。一九二〇年冬我驻防南县滋口时，为了减少当地农民的痛苦，经委员会讨论，派人秘密杀了恶霸地主欧某（其兄在赵恒惕处当少将高级参议）。事至一九二一年秋被告发，我弃职潜逃。

我原名为彭得华，一九二三年，改名为彭德怀，投考了湖南军官讲武堂。但仍与原部队中的救贫会保持联系，负责主持委员会的是王绍南、张荣生二人，负责同我取得联系的是李灿（后来是红军八军军长，一九三〇年负伤至上海医治被蒋介石杀害）。

一九二四年秋，我由讲武堂毕业，仍回第六团任连长，不久即任营长。部队中救贫会的秘密组织仍然保存，并且仍在起作用。其纲领已发展为六条：（一）反对列强干涉和瓜分中国，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二）罢工、罢课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三）军队官兵有讨论国事自由，禁止军官对士兵答责、罚跪；（四）打倒为富不仁的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五）发展实业，救济贫民；（六）提倡科学教育，废除私塾。以上这些条文，在当时的环境下，在军队中是有其进步意义和起了一定作用的。

一九二六年秋，参加北伐军围攻武昌时，王绍南等三名会员英勇牺牲。但是，我最幸运的是认识了段德昌同志。当时部队改为独立第一师，段为师政治部秘书长，我为代团长仍兼第一营长。这时，段对我的思想帮助是很大的。他经常送给我一些进步刊物，特别是共产主义ABC，阅读后印象较深。他多次给我介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和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段的这些革命思想，对于我的思想是起了促进作用的，而又通过我向秘密的士兵组织进行教育。从而，我知道了他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我向 he 提出了入党要求，他允为介绍人，但为了避免影响国共关系，

党组织决定在第八集团军中暂不发展党员，因此，我的入党要求也就没有得到批准。当时我想，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为了解放劳苦大众，为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我一定跟着共产党走，努力工作，争取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普通战士。

一九二七年元旦，在一营部（宜昌）召开了救贫会员大会（当时会员已发展为十七人）。大家认为救贫会应作为核心领导（秘密组织），在士兵中广泛组织士兵会，并争取合法。士兵会章程有五条：

（一）士兵出身于工人、农民阶级，吃饭穿衣都是工人、农民生产出来的，我们要为工、农服务；

（二）拥护孙总理遗嘱，拥护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军阀和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实行减租减息，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

（三）既是国民革命军，就要实行官兵平等，反对军官打骂士兵，禁止体罚，反对克扣军饷，实行经济公开；

（四）士兵有革命言论、集会自由，有阅读进步书报自由，连士兵委员会由士兵自由选举组成之，再由连士兵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自由选举营士兵委员会，自觉地管理军风纪，不赌博，不强奸妇女，不扰民，实行士兵自治；

（五）士兵委员会，有监督、逮捕反革命分子解送军事法庭审判权，并有陪审权（此条有的人主张删去，但多数人同意保留，即保留了）。

在讨论这个章程时，大家认为是含有拥护共产党的进步因素的，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为工、农服务。但表示拥护孙总理遗嘱使国民党也抓不了辫子。为了巩固在当时情况下的第一营救贫会的秘密组织和广泛地组织士兵会，提出了这样的章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得到士兵拥护的。所以仅经过了十余天的准备时间，便在全营广泛地组织起来了。这个组织在当时的国民革命时

期，起到了巩固部队，提高士气、参加革命的进步作用。

一九二七年夏，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以后，大量共产党人被杀害，进步的工、农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遭到了反动势力的严重摧残，而造成了严重的白色恐怖。当年秋独立第一师由皖北绕经汉阳、沔阳退回湖南南县时，召开了营士兵委员会，大家共同分析了当时形势，找出了奋斗目标，并决定公开取消士兵委员会的名义，而保持其秘密组织和活动。大家认为，当时主要是应该保存实力，注意在其他营团中进行革命的秘密活动，以便扩展革命力量；对地方上由土豪劣绅组织起来的清乡委员会要给以抵抗，不能使其兴妖作怪。会后得悉，南县的土豪劣绅准备在“双十节”成立清乡委员会。我们便派人于九日晚在县城散发大量传单，其内容：打倒土豪劣绅！枪毙清乡委员会的成员！工、农、兵、学团结起来打倒新军阀！……等。第二天早起，城乡满布革命传单标语。土豪劣绅们便由兴高采烈一变而为惊魂落魄，亦有逃往长沙者，而清乡委员会的成立，即变为泡影。在这以后，有几个月南县没有人敢出来再搞清乡委员会的组织，从而保护了南、华、安党的特委和南县县委的存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把详细情况告诉了段德昌同志（他当时因秋收暴动负伤，隐藏在家，同南、华、安特委有联系），并且同他讨论了蒋介石的反动性，也讨论了戴季陶、孙科等等反动集团的行为；他谈论了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农兵和青年知识分子。段德昌同志又对我的坚持对敌斗争的立场加以鼓励，他说我那种对敌斗争的决心很好，但是要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一定不要暴露自己，扩张力量，争取能逐步掌握到一个师的力量，伺机起义，对革命将会起到很大作用。他又说，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失败了，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到处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但是，他是杀不尽的。这些勇敢的人们，必然要起来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人类的解放事业进行不屈的斗争。段继续说，当时革命处于低潮，要

准备长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也要准备最大限度的耐劳耐怨。段德昌同志的这些话，给我指出了正确的为劳苦人民谋福利的斗争方向，也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并使我对革命增加了很大的信心。当时段德昌同志参加秋收暴动负了伤。他对我说，要经常同特委取得联系，要紧紧依靠党，这样自己的斗争才不是孤立的。我说我仍希望加入共产党，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他又送给了我两本书，一是通俗资本论（这本书一直保存到长征结束后，红军到了陕北吴起镇，被参谋清理文件烧了，十分痛惜）；另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三日黄昏，党的南华安特委书记张匡（代名）同志来到我处说，段德昌同志为我的介绍人，特委已经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只等省委批准。我当时对党给予我莫大的信任感到荣幸，但我对段德昌同志负伤感到不安。我说，最好使段德昌同志改为姓章，住到李灿家里（二连长）让我团的伍军医给他治疗，伤可能会好得快些。张匡同志答应了。他又介绍了一个叫邓萍同志的人，要我在部队中给他安插一个位置，我答应了。他又了解了一下部队的力量情况，我都一一介绍了一遍。我们虽然初次见面，但鉴于奋斗目标的一致，便推心置腹地谈到深夜。后来派张荣生同志送他到郊外。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底，张荣生同志口头告诉我说，特委已经接到省委回信，批准了我为正式党员。并问我何时方便，举行入党仪式。我说元旦黄昏后，到我团部办公室，那里比较秘密。届时张匡、邓萍、张荣生（都是党员）三同志来到我处，即举行了庄严的入党仪式。我宣誓：“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准备牺牲一切，甚至必要时献出生命，永不叛党”。从此，我有了政治生命，有了党的领导，也有了远大的理想。从而也走入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康庄大道。

二、平江起义的经过

一九二八年元旦我入党以后，李灿同志也相继入党，后来特委又派来一个交通李光同志，再加上邓萍、张荣生二人，我们五个党员便成立了一个支部。原来的士兵委员会，也就有了共产党支部为核心领导（不再是救贫会来领导）。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已经取得了政权，同时，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也产生了新旧军阀间的矛盾。保定系和士官系军阀为本身利害，对黄埔军校系军阀有严重不满和恐惧情绪。支部会议研究了当时这些具体情形，准备扩展部队中的革命力量，所以拟在本团办一个学兵连，专门轮训班长和上等兵，以便培养新生力量。在筹办学兵连的工作时，在谈话中我发现周磐（师长）对南京政府和湖南当局也有不满情绪，我便趁机建议由师办一个随营学校，轮训班长，六个月为一期，周同意了我的意见。但说没有适当的人才。我说，黄公略是你保送黄埔高级班的，看来他担任此职极当。周即托我写信给黄公略同志回来筹办随校工作。

公略是一个求知欲很高的老同志，我们一九一九年即认识了，以后他在湖南讲武堂学习，彼此非常了解。毕业后，他回独立一师三团刘济仁部下当排长，后在北伐时期当连长。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周磐保送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他在广州暴动（起义）后，加入了共产党。

一九二八年时值三月天气。公略同志由黄埔军校毕业来到了我团部，老朋友久别重逢，实有说不出的欢欣之情。和他同来的有黄纯一（共产党员）、贺国中（对革命事业非常热情）二人，公略同志托我和周磐商量一下，争取录用纯一、国中二人。以后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我也就把我团的党组织情况和士兵会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工作任务和已经取得的工作成绩等，一一作了介绍，我说，现在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第一团只有第一营有党的

组织，第二、第三营现在才准备发展；第二、第三两团，最好通过随营学校发展士兵会，再进而发展党员，争取在两年的时间内做到全师多数连有党员，各连都有士兵会员。当时我们也研究了一些具体工作，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分头去进行。

三月中旬，周磐由长沙回到南县主持随营学校开学典礼。成立三个学生大队，任命黄石（公略）为校长，黄纯一为教育长，贺国中为队长。四月中旬，独立一师奉命开驻平江接替阎仲儒旅防务。第一团驻平江城内，其中第二营驻在城南约五十里之思顺；师随营学校开驻岳州（岳阳）；第二、三团分驻在北乡虹桥和长寿街两个地区。后来在六月下旬，黄公略同志由随校校长调任第三团三营营长职务。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八日，据我士兵会会员陈玉成（给周磐当马弁目，是我们的秘密情报工作者）由长沙来密电称：南华安特委被破获，黄石在南县写给特委的通行证也被搜获，周磐认出是黄石的亲笔迹，黄被供认是共产党员，周已电李惠根（付师长）逮捕黄石、黄纯一、贺国中三人。再者由于我同平江电报局有联系，故周给李之电报被我收到了。根据两方面的可靠情报看来，情况实属严重，我便即刻召开了团委紧急会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决定起义，并且制定了起义计划和步骤。湖南省特派员滕代远同志恰于此时到达平江，参加了会议，他对于起义的政治准备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会后，即按照计划开始了各方面的布置。可是，在二十日夜半，第三团团团长刘济仁来电话，说黄石于当日黄昏时杀死其侄第十连长，领导全营闹饷譁变，逃往南山（浏、平交界处）。从刘来电话得知，黄公略同志未按计划先行起义。我们又立刻召开了团委会议，大家认为一定要有一定的起义准备工作，所以仍决定按原计划进行。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午，正式宣布起义。首先利用午睡的时间消灭了当地的反动民团、警察以及师的直属队，共约两

千余人，在平江城内首先胜利。至二十二日午后驻离城五十里的第二营也应调按时开回平江城。二十三日午后，随营学校由岳阳也按时开到平江。黄公略同志领导起义的那一个营，当开至离平江城五里处休息时，黄即离开部队亲自来城内商讨以后的工作布置，刚到不久，即得悉该营在九连连长贺仲斌的煽动下背叛了起义向南逃窜。公略同志去该营任职为时不足一个月，此种譁变之事不算特别意外，惟不按起义预定时间，起义后又不设法通知，在南县写给特委的通行证洩露秘密，这些是他的错误。如不采取机断处置，当时可能受到不可估计的损失。但是我们接受了这一严重教训，便在本团及随营学校中，进一步的发动了士兵群众，充分发挥了士兵会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洗反动军官的工作，把多年以来积蓄下来的公积金（在平江也筹了一点现金），每人发了十二元银洋（三千七百余人），给旧军官发路费遣送出境，从而提高了士气，保障领导机构的纯洁，巩固了起义部队。二十三日，平江起义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五军，下编为一、四、七团，每团约千人。雷振辉任第一团团长（后叛变），李灿为党代表；陈鹏飞为第四团团长，黄公略（石）为党代表，黄纯一为七团团长兼党代表，贺国中同志为副团长。营连长以及其他各级干部，也作了比较妥善的安排。经过一系列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巩固了部队，提高了士气，从而保证了平江起义的胜利。这个胜利主要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党领导下的士兵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并且也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得到了广大士兵群众和当地人民的拥护。不然，这次起义是胜利不了的。

但是，虽然取得了胜利，在军事上也犯了一次错误。本应在起义胜利后，马上把部队撤离平江县城，东进至江西修水、铜鼓一带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可是没有这样作，而错误的想通过击败敌人的进攻来提高士气和树立部队的声威。结果适得其反。七月三十日敌人分五路约七个团的兵力向平江城进攻，我第

一、二团在城郊与敌军激战终日；我七团企图协同第四团从敌侧后歼灭敌人一部，而四团未经请示深入浏阳（遭敌袭击，损失人员过半），因而失去联络，兵力分散。结果，因敌众我寡未达目的，伤亡约二百余人，黄纯一同志在此役中光荣的牺牲了！至黄昏后才安全撤出平江城。这是我参加红军后第一次犯的错误。为什么会犯那样的错误呢？现在检讨起来，主要是当时只有盲目的革命热情，而缺乏长远的战略方针，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要经过长期的游击战争，广泛地发动群众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孤立城市，积蓄自己革命力量，最后才能取得城市。对于毛泽东同志这种英明的正确的军事思想，我当时是非常模糊的。那是那次错误的关键所在。

三、第一次红四、五两军会师宁冈

一九二八年八月初，红军第五军离开平江进占了江西之修水、铜鼓。湘、赣、鄂三省反动军队又集中了十余团向我军举行“会剿”。经过两个多月的打圈子战术（敌称之为盘旋战术），才把敌人拖疲击退。在铜鼓之幽居，以滕代远、王首道同志为首的领导下，召开了湘、鄂、赣三省边区县委联席会议，成立了边区党的特委，王首道同志为特委书记，滕代远同志为红五军党代表。这次会议，总结了平江起义取得胜利的几条经验。第一，主要是由于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组织和计划；第二，是由于有湘、鄂、赣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第三，特别有井冈山的革命旗帜作榜样和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秋收起义的指引——这不是偶然的，是在北伐战争失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井冈山起了收容阵地和继续指导全国武装斗争的作用；总结了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运动的丰富经验，而成为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旗帜；是湘、鄂、赣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指路明灯。只有在它的指引下，我们才有胜利的前途。这次会议也反对了

乱烧乱杀的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会议决定：将红五军所部同地方游击队混编为三个纵队和一个军属特务大队。一纵队在平江地区；二纵队在浏阳、万载；三纵队在铜鼓修水坚持游击战争。黄公略任第二纵队长，并临时指挥其他各部。我和代远同志带五个大队，遵照湖南省委指示，在十一月初同红四军在宁冈会师了。到达宁冈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详细讨论了“六大”决议，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通过毛泽东同志的阐述，使我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也是毛泽东思想初次对我的传输，因此到现在尚记忆犹新。

在当时，湘赣两省反动军队向井冈山山区“会剿”形势已经形成。我红四军物质又极为困难（油、盐、药物，特别冬衣），红四军只有离开井冈山向外地发展，否则没有其他较好办法克服困难和搞乱敌人的“会剿”部署。可是，部队伤病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无法安置。派部队留守，就势必分散主力（当时红四军大约四千余人），不利于主力行动和作战。如不留部队据守，对坚持湘赣边区（井冈山）根据地斗争也是不利的。以一部分兵力防守井冈山，就可以吸引住敌人“会剿”的主力，对于当时红四军向赣南行动是有利的。红四军前委根据当时情况正确地决定，将红五军部分留守井冈山，并编入红四军，我为付军长，坚守井冈山根据地。我当时接受了这个任务，但在红军五军军委讨论时，意见是不一致的，多数同志是不同意五军固守井冈山。他们的理由是：平江起义推迟了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的“会剿”，现在，湘、赣两省白军主力对井冈山“会剿”而对湘、鄂、赣边区进攻的反动力量减弱，我们红五军部分已经完成了同红四军取得联络的任务了，就应当迅速北返，扩大湘、鄂、赣边苏区根据地。传达六次大会决议，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坚持，也有配合作用。而不应当承担固守井冈山的任务。井冈山虽然地势险要，周围约近二、三百里，弹缺兵力也少，是守不住的。但是，我和代远同志为了照顾

全局，使红四军摆脱当时面临的困难，自愿的承担红四军前委给予的任务，并且准备必要的牺牲，因而坚决的执行了红四军前委的决定。现在看来，上面这是中国革命中极渺小的一件事情，同时有些人的看法当时有些片面。然而对我自己当时的思想政治水平来说，执行当时那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就不是一件小事情。在敌军合围攻击下，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至此，经过半年的实际考验，在半年最艰苦的环境中我没有任何动摇过，可以证明我的入党动机是纯良的，对革命事业也是忠实的，并且有自我牺牲准备的。

四、第二次红四、五两军会师瑞金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才三天，湘、赣两省白军约十余团向井冈山合围攻击。经过三昼夜激战后，湘军攻破我黄洋界和八面山阵地，直逼大小五井；赣军攻破我白泥湖阵地，直迫茨坪。情况十分严重，唯有遂川方面之小行州阵地未被攻破。原前委决定红四军在敌围攻井冈山时，从外侧翼打击敌人，全无消息，为了免遭复灭，我们便率领收容起来的六、七百人，再加伤、残、病、弱共千余人，从井冈山腹部峭壁向南突围，在左安又一次遭敌伏击，突破重围，经过数昼夜艰苦战斗才脱离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当时饥寒交迫的困境是无法形容的）。但是敌人仍继续追击、堵击、侧击，我军经崇义、安远、会昌等县境，约月余才到达兴国之莲塘，东村地区，找到了当地党组织和二团。这时，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和群众的掩护下，对于敌情比较明了，并且得到了两天休息。在这次长途战斗行军中，所部仅剩三百余人，从而也深深体会到根据地的重要性。哪里有地下党组织或者地下党员时，那里的群众对待红军的态度就显然不同。略加休整时，白军刘士毅旅又追逼占领莲塘。我军乘夜脱离了白军追击，而奔袭于都城，消灭了刘旅留守部队一个营和民团共约千余人，待刘旅急转回救

时，我又转移攻占安远县城，消灭了该城民团数百人。当时，仍准备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区根据地。在安远县城的反动县署搜得文件获知红四军攻占长汀的消息。为了配合红四军的行动，我军又北进占领瑞金（滕在于都负伤休养）。这时红五军部分从三百余人，又发展到了七百余人。不久，在瑞金与红四军又会师了。时值一九二九年三月，在瑞金我在毛主席处看到了中央的二月来信，其大意是认为当时形势特别严重，要红军采取分散潜伏活动；毛朱离开部队，减小目标。我当时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虽然情况紧张，但是游击战争是可以坚持的，越是时局严重，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就越不能离开军队。所以我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原稿在主席处），经毛主席略加修改，由四军前委转给中央了。

两军在瑞金住数日后，即开于都。经过四军前委的同意，我们率五军又回到了井冈山，恢复湘赣边区根据地和政权。我们回到湘赣边区，所见情况异常凄惨，房屋及一切都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人民的衣服、食盐、药品等等，均非常困难。但是蒋（介石）和湘桂粤军阀的矛盾已经很尖锐。我们便约同特委和王佐商量，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由我们率领五军千余人并王佐百余人，先攻占了酃县、桂东两城，放出“会剿”井冈山时被捕去的大批同志和群众，次第攻克广东之城口、仁化、南雄诸城镇后，又回师井冈山。通过这次行动，筹办了现款数万元以及大批食盐、布、药品等，将其大部都救济了边区群众；也缴获了约三百支步枪以及数万发子弹，按其比例多分了一些给王佐部队，他很满意。当时王佐部队是受特委领导的，我们既不指挥其行动，又不干预其内部事务，那时我们同王佐关系还是好的。

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召开了边区特委和五军军委联席会议，讨论了边区工作布置问题。会议认为，使白军在永新、莲花两城更加孤立，决定五军进攻安福县城。我不同意，其理由是即

使取得此城，也不易巩固，如攻而不克，更增加了困难。但是绝大多数同意夺取安福城。我军进至严田（安福城西约三十里）即与敌人两个连相遇，一经接触，敌人便逃窜至安福城内。我追至城关时，得知是一个团驻守此城，而不是原估计的一个营的兵力，城虽小而高且坚，不易攻取，当日即撤回严田宿营。翌晨出发即被敌四面包围，敌人如此迅速，真出于意料之外。幸赖我红军英勇，从南面突围而出。这次战役伤二百余人，参谋长刘之志及四纵队司令贺国中二同志英勇牺牲，五纵队司令李灿同志负伤，九个大队长有八个同志伤亡。鉴于这次损失之大我是有责任的，不该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但后悔晚矣，只可作为教训。八月下旬我军正在文竹（莲花、宁冈交界处）休整，敌军谭道源和张辉赞两师分四路又来夹攻。我军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后，又乘胜北进占领万载、铜鼓。

在大桥（万载城西）召开了五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了一年多来异常艰苦的宝贵的斗争经验。在红四军前委的帮助下，初步学会了如何做群众工作，建立军队及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扩大根据地的工作方法。对于实行土地改革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如何作到抽肥补瘦，还是比较模糊的。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如何执行红四军前委的一年夺取江西的计划问题。大家认为，这个方针应该是我们行动的方针，要积极配合此计划，并力求实现。但须首先积极争取井冈山、幕阜山脉、九宫山脉根据地联成一片，同赣东南红四军和赣东北方、邵部遥相呼应，相互配合，造成夺取江西的有利形势。红五军军委在当时也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工作方针，但在时间上也可能比一年要长一些，不能机械了解。并决定，将红五军扩充编为五个纵队，每纵队下编五个大队。在统一指挥的基础上，划分了各纵队的大概活动区域：一纵队在平江、修水、通城；二纵队在浏阳、万载、萍乡；四纵队在湘赣边区；五纵队在阳新、大冶、通山、武宁；三纵队在铜鼓及其以东，并准备